


隐蔽行动

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高慧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隐蔽行动

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高慧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高慧
开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643-1

I. ①隐… II. ①高… III. ①中央情报局(美国)—
影响—危地马拉事件(1954)—研究 IV. ①D871.2
②D7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250号

责任编辑 郭立群

封面设计 王小阳

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高慧开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43-1/D·1815

定价 20.00 元

典个一景流运行嘉朝由外延讲本网站只此就露硕设策鼠跳静央中,五
千爵由史页面一丁期景图变前考干”燕朝“国美共其[1]异议,网家陆壁

前 言

鼠跳静央中,中野五前考年”带鼠网中“核已秘认悉美间限站各办
的国美丁康蜂革药会并此只鼠就蚤蚤,议对由由许燕朝事从丁千翔刻
燕版策燕野心用益燕鼠跳静央中,益保能同公品果合海一一西公国朝
露燕出。前博而页的大百不雷博美丁益查科建一近,对燕讲本网丁随

自二战以来,美国很少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无动于衷,在很大程度上讲,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美国,哪里有美国,哪里很可能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这种状况如今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作为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涉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高潮,并表明随时准备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欲要的“秩序与稳定”。这些干涉活动的目的并不像美国决策者宣称的那样“娓娓动听”,其给干涉地区带来的动荡日益显而易见。美国对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干涉手段多种多样,形式不一,但可分为“公开”和“隐蔽”两大类。“公开”的干涉往往是政府直接出兵或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对被干涉国家实行制裁或其他活动,这类干涉活动更为“直接”,让世人“一目了然”。“隐蔽”的干涉通常是“间接的”,即由美国政府提供钱财和物资支持被干涉国家的反政府力量来达到推翻对美国敌对或“不友好”政府的目的。这类干涉活动在冷战期间比较常见,而且往往发生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中。无论是美国公开的武装干涉还是秘密的隐蔽行动都对被干涉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消极的影响。二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维护着美国的利益。加强对执行隐蔽行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透视美国外交行为的本质特

征,中央情报局策划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隐蔽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对我们认识美国“隐蔽”干涉的实质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一、研究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的意义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峙与对“中间地带”争夺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被赋予了从事隐蔽行动的权力,适逢危地马拉社会改革触犯了美国的跨国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中央情报局就运用心理战策划推翻了阿本斯政权,这一事件在拉丁美洲留下巨大的负面影响。此选题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首先,中央情报局是二战后在美国与苏联对峙的冷战背景下成立的一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情报部门,其任务主要是为美国外交决策者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因此,不管正确与否,也不管是否与实际状况相符,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往往对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往往被视为一个神秘的王国与学术禁地,很少学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即使偶有研究,也只能接触到皮毛,受资料所限难以深入。冷战结束之后,作为冷战重要工具的中央情报局随着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逐渐进行体制改革与功能转换。冷战初期档案文件开始解密,致使美国学术界对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基本上仍是一个空白地带,我们有必要利用这些原始文件填补此项研究空白。

其次,危地马拉共和国是一个至今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但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重视与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学术界除了对其古老的玛雅文明有所了解外,该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尚未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危地马拉有着悠久的古老文明

与遭受西方国家侵略或殖民的屈辱历史，至今依旧是发展中国家。研究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权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颠覆的过程与教训，对于加深我们对危地马拉现代社会的认识和未来中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美国向来宣称是民主、自由、人权的灯塔，并以向世界传播这些为自豪，为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其实美国政府的外交行为还包含鲜为人知的隐蔽行动，这些活动仅在冷战初期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操纵下进行过十余次。中央情报局在其他国家的秘密活动为人们认识美国冷战期间的外交实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是国外很多学者关注中央情报局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策划政变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影响至今不仅在中美洲仍然存在，而且波及美国的旧金山海湾地区。许多人在政变后被冠以共产党人和恐怖主义者的名义而遭受迫害，土地改革遭到扼杀，随后引发的长达 36 年的内战使 20 余万危地马拉人丧失生命，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成为政治难民，其中一些人经墨西哥辗转到达美国。^①揭示这一具有现实影响事件的深刻根源，对于我们认清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本质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第四，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美国利用隐蔽行动干涉拉美国家内部事务的一个开端。如果说杜鲁门总统批准建立中央情报局的初衷只是为了搜集情报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把它升级为对外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工具。这种功能的转化与冷战的升级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其中涉及的主要美国高官有艾森豪威尔总统

^① Tyche Hendricks, "Coup Still Scars Guatemalans 50 Years Later/Anniversary Recalls Civil War that Sent Half-million to U. 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CA), Jun 26, 2004, 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

与国务院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及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因此,探讨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和美国高层决策的内幕。

二、美国学术界的研究

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并不容他国染指,早就是美国决策者的一种传统观念:从门罗宣言演进到门罗主义和泛美主义,这种传统观念不仅贯穿始终,而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美国学术界从未忽略过对拉美国家,尤其是对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研究。美国的拉美研究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作为开冷战后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滥觞的针对危地马拉政变的“成功行动”,自然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内,半个世纪以来对此的著述一直未断,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2000年11月,斯蒂芬·M·斯特里特(Stephen M. Streeter)在《历史教师》上发表了“对1954年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解释: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的观点”一文,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理论性较强的梳理。斯特里特将研究者的观点概括为三类: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①斯特里特对这一课题研究观点的归纳,无疑为我们全面了解美国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所作的研究深度提供了方便,但是就研究的广度来说还需要配合时段来划分。根据时代背景和资料来源及研究成果的差异,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初始

^① Stephen M. Streeter, “Interpreting the 1954 U. S. 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 Realist, Revisionist, 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4, No. 1 (Nov. 2000), pp. 61~74,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JSTOR数据库中得到。

的解释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是研究有所突破的起步阶段；80年代是研究的发展阶段；90年代至今，尤其在90年代末此项研究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一）研究的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由于危地马拉政变刚刚结束，要作出高质量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研究所用的资料仅仅限于官方的公共政策和媒体报道；二是中央情报局本身是一个秘密机构，档案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这就构成了研究的一个瓶颈；三是此时正值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国际上美苏冷战骤然升温的时期，研究者必然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所以出现反共的现实主义观点，也是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比如反共的丹尼尔·詹姆士(Daniel James)、罗纳德·施奈德(Ronald Schneider)和约翰·马茨(John Martz)谴责侵略、扩张的苏联帝国挑起了冷战，想把世界都变成共产主义控制的天下。因此他们相信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是苏联一手扶植的傀儡，这样推翻阿本斯政权自然就意味着把共产主义从西半球推了回去。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出版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美国政府政策的解释说明甚至美化。例如，1955年纽约展示出版社发行的《危地马拉历史概况》一书，作者艾米·伊丽莎白·詹森(Amy Elizabeth Jensen)就公开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竭力歪曲危地马拉政府实行的民族民主主义改革，为中央情报局促成的军事干涉多方辩解，他在此书的目录中就有这样的标题“第五部分 危地马拉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它下面的第三个小标题就是“共产主义从危地马拉向外蔓延”。^①其他

^① Amy Elizabeth Jensen, *Guatemala—A History Survey*,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55, contents.

的著作还有卡尔曼·A. 西尔弗特(Kalman A. Silvert)的《危地马拉政府研究》(1954年),约翰·马茨的《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渗透》(1956年),罗伯特·亚历山大(Robert Alexander)的《拉美的共产主义》(1957年),梅·斯泰西(May Stacy)和G. 普拉扎(G. Plaza)的《在拉美的联合果品公司》(1958年),罗纳德·施奈德的《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1944~1954》(1958年)。这一时期的成果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研究,其引用的资料与发表的观点和事件发生时官方发布的如出一辙、没有什么区别,尚处于原地踏步状态。

(二) 研究的起步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

这一时期由于“新左派”的兴起与越南战争的教训引发了历史学家们对主宰很多学者研究视野的冷战思维产生了怀疑,此时依附论的兴起鼓励着拉美学者把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事件视为发达国家中心区支配边缘地区的一个例子,修正学派的观点因此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逐渐得到认可。持修正学派观点的历史学家认为冷战的主要责任在美国,强调华盛顿寻求到海外尤其是第三世界扩张市场是为了促进美国对外投资,断言国务院为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发动对危地马拉的干预就是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学者们开始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有的学者还从经济动机的角度分析政府的决策。例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理查德·J. 巴尼特(Richard J. Barnett)、乔伊斯(Joyce)和加百利·科尔科(Gabriel Kolko)就认为美国通常反对第三世界的民主,“门户开放”政策导致了美国为了保护贸易与海外市场对拉美等不发达地区进行了无数次的干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大学特殊军事行动研究办公室的《对叛乱和革命战争的案例研究:危地马拉,1944—1954》(1964年),怀斯(Wise)、

大卫(David)和托马斯·罗斯(Thomas Ross)的《看不见的政府: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1964年),约翰·杰拉西(John Gerassi)的《巨大的恐惧:拉美重新夺回了拉美》(1963年),琼斯(Jones)与切斯特·劳埃德(Chester Lloyd)的《危地马拉的历史与现状》(1966年),戈拉斯(Gollas)和曼纽尔(Manuel)的《剩余劳动与经济发展——以危地马拉为例》(1970年),大卫·格林(David Green)的《拉美的遏制:睦邻政策的神话与现实史》(1971年),赫伯特·帕米特(Herbert Parmet)的《艾森豪威尔和美国的十字军战争》(1972年),科尔·布莱齐尔(Cole Blasier)的《盘旋着的巨人:美国对拉美革命变化的反应》(1976年),托马斯·麦卡恩(Thomas McCann)的《一个美国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悲剧》(1976年),何赛·艾瓦尔·德索托(Jose Aybar de Soto)的《依附与干涉——以1954年的危地马拉为例》(1979年)等。

80年代初,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达到了鼎盛,其标志性成果是《苦果——未曾披露的美国策划危地马拉政变的故事》(1982年)著作的问世。此书是两名新闻记者斯蒂芬·施莱辛格(Stephen Schlesinger)和斯蒂芬·金泽尔(Stephen Kinzer)撰写的,作者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联合果品公司如何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共谋把阿本斯拉下台,坚持认为联合果品公司在本次政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该公司不把阿本斯政权赤化并夸大“共产主义威胁”的话,艾森豪威尔政府可能就不会重视危地马拉的政局,联合果品公司与政府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前者能够对华盛顿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看法切中了干涉的要害,却缺乏进一步论证的一手资料,作者较多地以推理得出结论,从而影响了该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 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

与《苦果——未曾披露的美国策划危地马拉政变的故事》一书几

乎同时出版并对斯莱辛格和金泽尔的共谋理论提出挑战的,是由理查德·H. 伊默曼(Richard H. Immerman)用“成功行动”档案资料撰写的专著《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1982年)。作者赞同阿本斯政权并没有对美国构成共产主义威胁的修正学派观点,也揭示了中央情报局的后勤援助对于危地马拉反政府领导人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的重要性。但是伊默曼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决定通过军事干预推翻阿本斯,并不是因为联合果品公司游说的压力,而是由于美国官员把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国务院没有了解到阿本斯是一个为阻止而不是鼓励共产主义传播而实施土地改革的“中产阶级”改革家。^①伊默曼强调的是误解导致了阿本斯总统的辞职,是心理状态、官僚政治和文化偏见形成了华盛顿对危地马拉和其他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观念。后修正学派史家是从战略与经济相结合的因素解释冷战,他们更注重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上论述华盛顿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误读,据此理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转而反对阿本斯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他是一个民族主义代表,而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即艾森豪威尔总统与他的顾问们按照思维习惯混淆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历史学家罗纳德·W. 普鲁森(Ronald W. Pruessen)在1985年9月发行的《激进的历史评论》上撰文,认为伊默曼对反共的描述过分地夸大了,他想搞清楚政治、战略、经济、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如何结合在一起导致华盛顿要推翻阿本斯政权。^②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Robert Freeman Smith)在1983年的《美洲历史评论》上撰文指出伊默曼的观点是

^① Richard H. Immerman,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p. 182.

^② Stephen M. Streeter, "Interpreting the 1954 U. S. 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 Realist, Revisionist 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4, No. 1 (Nov. 2000), pp. 61~74. 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

基于国家档案、各种手稿、口述历史记载和对许多前美国官员的采访，他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反共的危地马拉人也会废黜阿本斯。史密斯认为此书对美国政策持有过分简单化的观点。^①

伊默曼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确实成为这个时期一本划时代的力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引用的资料中增加了不少口述的记录，也开始从心理和文化层面认识这一历史之谜。伊默曼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新资料去揭示事件真相，而且从政治、经济角度的分析深入到了内在的文化视角，这是对此问题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当然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伊默曼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出兵危地马拉是由于美国官员把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这种观点实际上掩盖了美国政府完全出于本国利益考虑的干预本质，显然是一种巧妙维护官方立场的御用说辞。

随着美国政府文件的解密与当事人的离职或去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加，观点也呈现出综合与多样的特征，出现了不少有力度的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中央情报局的专著和论文。1981年由美国艾森豪威尔文件集的编辑斯蒂芬·E. 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撰写的著作《谍战伴随艾森豪威尔》出版。此书用大量史料描述了艾森豪威尔在担任二战期间盟军最高统帅和美国总统时期对美国情报机构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后利用中央情报局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秘密战争，使中央情报局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对外政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得力部门。该书的特点是利用传记性的资料讲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心理战的关系，注重过程描述，文学性有余而

① Robert Freeman Smith, "Reviewed Work(s):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by Richard H. Immerm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No. 3 (Jun., 1983), pp. 781~782. 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

史实性不足。另外的著作还有希尔·布哈德拉·亚吉(Sheel Bhadra Yajee)的《中央情报局对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1985年)、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的《总统秘密战》(1986年)、威廉·布卢姆(William Blum)的《一段被遗忘的中央情报局史》(1986年)、乔治斯·A. 福里奥尔(Georges A. Fauriol)与伊夫·洛瑟(Eve Loser)的《危地马拉的政治之谜》(1988年)、罗德里·杰弗里·琼斯(Rhodri Jeffreys-Jones)的《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民主》(1989年)、劳伦斯·C. 索利(Lawrence C. Soley)的《无线电战争》(1989年)等。

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篇题目是《美国在1954年推翻哈科沃·阿本斯中的作用》的硕士学位论文认为,在1953年和1954年,美国公民被一种观点所说服:危地马拉政府的阿本斯总统给美洲带来了一种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但是《信息自由法》公布的政府文件显示上述威胁并不存在。事实的真相是美国的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及其执行部门共同策划废黜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总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知情与认同下,国务院的杜勒斯及其弟弟中央情报局长艾伦共同发动了一场反对危地马拉的战役,从此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比此前想象的要更加复杂与专横,是一个政治掮客和国际政客。^①这些观点来自危地马拉受内战之苦而移民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作者依据当时解密的最初文件得出了客观而正确的结论。

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干涉危地马拉是“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的首次试验”^②。1953年7月27日美国用军事行动遏制共产主义的朝鲜

① Christopher F. Porter,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the Overthrow of Jacobo Arbenz in Guatemala in 1954: Eisenhower's Latin American Policy (Cia)," *Ma*,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1986. 文章摘要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PQDD 数据库中获得。

② Gordon L. Bowen, "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Radical Change: Covert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0~1954,"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0, No. 1, *Central America: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Winter, 1983), p. 89. 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

战争已经结束,况且1954年的危地马拉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怎么能说美国干涉危地马拉的事件是“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的第一个试验”呢?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与历史事实有着较大的出入。

(四) 研究走向深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

斯特里特认为后修正学派忽视了在推翻阿本斯政权过程中危地马拉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1991年皮罗·格莱杰塞斯(Piero Gleijeses)的《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和美国,1944—1954》一书的出版大大地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作者在这本书中披露了许多新资料,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是提供了在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威胁”的更加清晰的画面;二是证实了后修正学派的主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认为联合果品公司的困境只是一个“附属”问题,与共产主义问题相比是次要的;三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就阿本斯土地改革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影响和对农村的影响相比,对前者的考虑比较少,因为有情报表明土地改革将“动员至今迟钝的农民支持政府”,并“给共产党人提供像组织其他国家工人那样组织该国农民以扩大其影响的机会”。^①亚伯拉罕·F.洛温塔尔(Abraham F. Lowenthal)认为,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颠覆的短命的阿本斯政府是危地马拉历史上最好的政府,他同意格莱杰塞斯的一个主要观点,即美利坚“帝国的傲慢、对安全的考虑和经济利益共同相互作用”导致了危地马拉历史上这一血腥的悲剧。^②格莱杰塞斯的分析具有创新

① Stephen M. Streeter, "Interpreting the 1954 U. S. 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 Realist, Revisionist, 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4, No. 1 (Nov. 2000). 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

② Abraham F. Lowenthal, "The Western Hemisphere," *Foreign Affairs*, p. 176. 全文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

的一面,也有微观解析事件背景的显著特点,但是他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也淋漓尽致地把冷战思维引进到了学术研究之中,因此得出了与历史事实不一致的结论。

如前所述 1991 年皮罗·格莱杰塞斯的《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和美国,1944—1954》一书,似乎成为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定论,但是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公开新的档案文件,围绕美国在推翻阿本斯政权问题上的一些谜团逐渐大白于天下。1992 年中央情报局聘请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卡拉塞(Nicholas Cullather)编纂官方版本的《成功行动》,同时研究中央情报局的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Gerald Haines)也撰写了一份单独的关于中央情报局针对危地马拉政权暗杀图谋的报告,这两个研究成果直到 1999 年才公开出版。卡拉塞的研究是从情报组织的视角出发,他像其他后修正主义者一样,不重视联合果品公司的作用而突出安全的考虑: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联合果品公司劝说国务院关注危地马拉的。此项研究还对两个重要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证据:一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选定阿马斯而不是其他军官领导“解放军”;二是“成功行动”对阿马斯胜利的重要性。卡拉塞赞成阿本斯的辞职应该归因于政府军队不忠诚的观点。国家政权从阿本斯手里转向阿马斯,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政变,而不是一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①卡拉塞充分利用新的档案文件认定危地马拉政变实质上是一次军事政变,得出的结论好像客观、公正,其实这种观点有把事件本身简单化为危地马拉内部事务,而解脱中央情报局干涉别国内政的历史重负的嫌疑,因为这次军事政变是在美国中央情报部门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而不单纯是国内反对派针对现政权

^① Nick Cullather, *Secret History: 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2~19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7.

的军事行动。

——美国学术界出版或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论著，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看法，似乎这一研究课题很难再有挖掘的空间了。其实，还有相关的一些美国原始文件记录未解密，联合果品公司也尚未公开其档案，所以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当然就像对冷战起源的长期争论仍然没有停息一样，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辩论也不可能单纯因为新资料的发现而结束。到20世纪末关于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历史著作已经成熟到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述导致阿本斯下台的一系列事件的地步，冷战结束后对这一事件的重新认识将会出现很多的不同观点。从20世纪之交的相关著作有约翰·雅各布·纳特(John Jacob Nutter)《中央情报局黑色的军事行动》(2000年)，约瑟夫·J. 特伦托(Joseph J. Trento)的《中央情报局秘史》(2001年)，罗德里·杰弗里·琼斯的《斗篷与美元：美国秘密情报史》(2002年)，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的《情报战》(2002年)，威廉·J. 多尔蒂(William J. Daugherty)的《行政秘密——隐蔽行动与美国总统》(2004年)，大卫·M. 巴雷特(David M. Barrett)的《中央情报局与国会》(2005年)，但还缺少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的专著。诚如2004年发表在《外交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言：“美国国务院的固定丛书FRUS最近出版了一卷《在危地马拉1952—1954年的政变与代号为PBSUCCESS的军事行动》，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在对待这段秘史方面显得有些迟钝。”^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是“解构”这段历史的大好时机，更应成为深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良好契机。因为档案材料的瓶颈基本上已

① Gerald K. Haines, "An Emerging New Field of Study: U. S. Intelligence," *Diplomatic History*, Jun. 2004, Vol. 28, Issue 3, pp. 441~449, p. 9.

经打破,数字化高速公路更是把研究送上了快车道。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1992年秋美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情报资料——112份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1993年对前苏联评估的许多情报被解密,还有数千份关于暗杀肯尼迪的材料被送往国家档案馆。1994年初,内定开放11个主题,包括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在意大利、伊朗、危地马拉、印尼、古巴、老挝、刚果和多米尼加的隐蔽行动。毫无疑问,公布大量的情报资料会极大地丰富美国外交史,这些文档将有助于厘清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对外决策过程及隐蔽行动的来龙去脉。使用情报记录进行研究不仅能说明国家安全机构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还能显示出决策者是如何运用这些情报并对此作出反应的,从而较好地理解中央情报局作为行政手段的角色,为人们比较公共外交政策和冷战期间美国总统秘密制定的政策提供了一种可能。文件的解密必然会颠覆原有的一些观点,使现行的相关著作重新撰写。

这一时期专著相对较少,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相关专题论文较多,两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涉及这一主题的:一篇是1993年州立圣何塞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美国、危地马拉和共产主义威胁》。作者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政变推翻阿本斯政权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危地马拉政府1953年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该国的土地,而是因为对苏联控制的“不容许自由行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心理^①。另一篇是199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隐蔽行动——美国干涉伊朗与危地马拉》。该文分析了总统在使用中央情报局秘密干预决定中情报组织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情报组织的核心机关中央情报局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它们的地位去推行隐蔽行动。

^① Brett Kenneth Johanson, "The United States, Guatemala and the Communist Threat," MA,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1993. 文章摘要来源于南开大学图书馆 PQDD 数据库。